

歐陽成和《南雲精舍日記》

李愛兵

南昌大學歷史系

《南雲精舍日記》，是一套未出版的日記手稿，清末民國初年江西學者歐陽成撰，現存江西省圖書館。全套日記凡三十四冊，敘事起於1907年，止於1939年。作者在日記中歷記其行事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社會變遷，蘊含其中。作者信仰心態，亦見於內。「其間民生之休戚，朝野之治亂，一身之得失，友朋之合離，披卷追稽，亦略可睹……」（第十六冊卷首序）。故此書為研究民國史的寶貴資料，價值很高，今特在此介紹，以饗同好。

一、歐陽成其人

歐陽成，字集甫，號南雲，1878年生，江西廬陵（今江西吉水縣）人。歐陽成出生於清末的一個鄉紳家庭，少時聰穎。1897年，年方19歲的歐陽成鄉試中舉，一時名顯。1906年，歐陽成考取官費留學生，負笈東瀛。

留日期間，歐陽成潛心西學，系統地研究了西方的經濟法律之學，對西方文明加深了認識和了解，視野大開，初具改良主義思想。1907年，歐陽成開始撰寫日記，將域外的種種經歷、見聞、感受一一記錄在日記本中。這些日記，忠實地記錄了他的留學經歷，成為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生活的一個縮影和見證。從此以後，撰寫日記的習慣伴隨了歐陽成的有生之年，最終留下了這套極其寶貴的總名為《南雲精舍日記》的日記。

1912年清室遜位，民國始創，歐陽成歸國。歸國之初，歐陽成寄居南昌，在李烈鈞幕府中任法律顧問。1913年，歐陽成以國民黨員身份當選國會議員，赴京議政。「二次革命」軍興，李烈鈞討袁。歐陽成謀求仕進，擁袁反李，欲附青雲。時成弟歐陽武，任李烈鈞麾下第一師師長（第一師為李之主力部隊），歐陽成遂為袁所重。袁世凱一方面令北洋軍南下，步步進逼；一方面委歐陽成以重任，命其勸弟易幟，答應事後加封

其弟為中將，取代李烈鈞掌贛。歐陽成感袁知遇之恩，自6月10日至7月3日，經贛往返，暗通消息，不遺餘力。歐陽武通電擁袁，但要求北洋軍不入贛境，以方便其節制約束部下，保境安民。然而袁軍節節進逼，歐陽武節節退守，部下譁然，歐陽武無力約束，兵敗如山倒。李烈鈞流亡海外，歐陽武被拘，囚於北京監獄。歐陽成如夢初醒，方知為袁世凱所利用，成為袁分化瓦解贛軍的一枚棋子。

「二次革命」煙消，經歷了由希望到失望的歐陽成，寓居南昌，在豫章法政學校任教員，經常以酒澆愁，情緒非常低落。「昔日馳逐京華之士，今乃為牖下槁處之人……」（第10冊2月13日）。歐陽成在南昌講學一年有半，「冀除精舍，再事靜修」，實際上是韜光養晦，以期恢復元氣，重新開始。1915年7月8日，歐陽成赴京謀職，8月17日開始在北京政府稅務處任事，從此開始了長達14年的仕宦於京生涯（1915年8月17日-1928年6月18日）。

民國初年，時局紛擾，變亂相陳。歐陽成仕微官於京，勞神案牘之餘，已漸熄昔日的豪情，「世事浮雲難自料，胸中激昂已自平」，開始將主要精力用於研習經史。

1928年，蔣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北京政府風流雲散，歐陽成賦閑於家（1928-1933），心情鬱鬱。除偶兼教職外，精力耗於子女撫養、家庭教育方面，對國家和社會，興趣逐漸減退，而治研國學未曾中綴，以隱學窮經自高，究覽典籍，並事校勘著述。

1933年，日本已陷東三省而窺視平津，歐陽成乃於7月26日舉家南歸（留三兒經孫夫婦留守京宅）。南旋之後，先任樟樹稽征所所長（1933年10月-1934年6月），後任教南州國學專修院（1935年-1937年7月），並受聘為省政府簡言臨川學會專任研究員（1935年-1937年11月）。「七

七」事變之後，狼煙四起，歐陽成遂於 1937 年 9 月避亂返鄉，修建祖祠，以了夙願。戰爭日熾，歐陽成安心鄉居，經理田宅，抄讀書自娛，平斷鄉里糾紛，遠離外面風雨飄搖的世界，直到 1939 年病逝。

歐陽成一生著述甚豐，編著有《吉水先哲碑傳集》(1929)、《前漢記》校注(1931)、《後漢記》校注(1934)、《公司條例》講義、《國際公法》講義、《商行為法》講義、《海商法》講義、《繼承法》講義，以及《南雲精舍日記》(1907-1939)等。

就日記所記，歐陽成一生經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留學時代思想激進時期；「二次革命」時積極進取時期；「二次革命」後觀望與思想退縮時期。癸酉「七月之亂」，實為作者一生運命之轉捩點，此後思想日益保守落伍，對傳統經籍版本的熱衷與執著取代了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救世意識，令人對於「社會轉型中的個人沉浮」深思不已。

二、《南雲精舍日記》的內容

《南雲精舍日記》是一套多卷本日記手稿，時間橫跨清末民初，敘事始於作者的留學時代，止於抗戰時期，大體上反映了作者從青年到晚年的真實人生和生動多彩的社會生活畫面。日記內容以時間區分可分為四個部分：

其一，留學東洋時期。

日記第 1 至第 8 冊為作者留學東洋日記，自 1907 年至 1911 年，分別為 1907(上、下冊)、1908(上、下冊)、1909(上、下冊)、1910、1911 各一冊。概括而言，主要記錄有學業情況、所研習之課程、時事感評、留日學生組織的活動、同鄉會的活動、革命與立憲、各種思想的衝突與交鋒、作者的思想傾向。此外為日常生活的記述、與親友書信往來、感懷詩作、天氣與心情、作息與健康狀況等，皆有記錄。清末留學生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群體，據統計，到 1905 年底，留日學生人數大約有 8,000 至 10,000 人。¹歐陽成日記，成為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經歷與生活的真實

寫照。

其二，民初及北洋政府時期。(1912-1928 年 6 月)

日記第 9 冊至第 22 冊。1912 年作者回國，日記敘其歸國後的活動、遭際，真實再現亂世的社會現實。此時日記側重於記敘戰爭活動、政黨謀略、議會政爭等重大歷史事件。

其三，國民黨統治時期賦閑北京時期。(1928 年 6 月-1933 年 7 月)

日記第 22 冊至第 27 冊。此一時期為作者偶兼教職的賦閑生涯時期。賦閑多暇，日記多敘治學、校勘、編著事；亦多敘家事、婚喪風俗禮節；此外亦多衣食住行、生活百用開銷之記錄。可觀一時之經濟與社會風俗流變。

其四，返回江西後的生活(1933 年 7 月-1939 年)

日記第 27 冊至第 34 冊。京華已成過眼煙雲，作者晚年重返故土。日記敘述返回江西後的生活、其任職經歷、其往來應酬、其家事、子女婚嫁、入學事，仍多敘日用百貨物價和日常收支費用。「七七」事變之後避亂返鄉，敘修建祖祠過程與一應費用及鄉紳生活之怡然自得，所記直到 1939 年病逝。此一時期的記載則提供了民國時期江西鄉村社會生活的最好藍本。

三、《南雲精舍日記》的價值

《南雲精舍日記》為日記體手稿，其體例結構鬆散，形式自由，所載內容不拘，故全書敘述面廣，記錄龐雜，涉及清末民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法律、人生百態、人物沉浮等諸多方面。由此，《南雲精舍日記》的價值是多方面的。

1、日記為我們瞭解清末士大夫階層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清末民初時期，社會正經歷滄桑巨變，傳統社會階層正經歷分合重組時期，傳統社會價值觀念亦經歷兼收中外，融合出新的過程。在這一變化過程中，清末士大夫階層的演變尤應讓人加以關注，這一階層曾是社會精英，遭逢亂世，其分

化是必然的。日記中作者之友人，有投筆從戎者，有隱居不仕者，有混跡官場者，有任教謀生者，有販書糊口者……，士人分化，種種際遇離合，不一而足。如日記中提到作者的一個好友熊繹元在清亡後就一直不出仕，以開書館為生，最後潦倒而終。除去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作祟之外，我們看到的是傳統社會精英階層在社會轉型巨變時期的調整適應或者不適應的過程，亦見社會人生變遷之縮影。

日記中所反映的歐陽成之經歷、作為、思想、社會生存方式，正如錢鍾書寫《圍城》描述了三四十年代留洋歸國的一部分知識份子典型一樣，也可以說是清末民初社會轉型時期一類人的縮影和代表。這一類人，既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具有讀書、中舉、入仕為官的正統人生三部曲的人生理念，又因其留洋多年，耳濡目染西方文明，有改革政治的願望。因而，這類人往往在變革的社會中常常要面對棘手的選擇，其心態也是矛盾複雜的，正是這樣一種很難簡單地歸類為「傳統」抑或「現代」的士人心態，使其一生反覆曲折，有許多尚待探尋的隱密史實，是我們瞭解民國社會的重要渠道。從日記看來，歐陽成思想最終逐漸趨於保守。²但是，一個留學東洋研習現代法律的學者，最終窮經皓首、隱歸家鄉，選擇了傳統士大夫的道路，本身就值得後人仔細研究和參悟。

2、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的許多重要事件，可以作為近代史史料的重要參考。

其最重要的體現之一是有關 1913 年「二次革命」江西戰事的史料。「二次革命」前後時局演變及江西戰事情形，牽涉到的相關人物，日記中濃墨重彩，有詳細敘述。作者京贛奔波，親歷其事，並有相關電文佐證，因而是第一手的史料，具有相當高的價值。已見前述。

體現之二是作者身為 1912-1918 和 1922-1924 時的國會議員，對國會開會情形、討論議案情形、解散議會情形（指袁世凱時期）、毆打辱罵議員、賄賂議員、國會流會等不堪情形皆有言及，從而真實反映了當時的國家政治、國家法律情狀

和社會生活現實，可作為民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有力參考，為治研民國政治史、法制史者所借鑒。

3、從《南雲精舍日記》看清末民國時期的社會生活。

就社會史研究而言，《南雲精舍日記》是研究清末民國時期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好資料。首先，日記中反映出來複雜的人情鄉土關係網，值得治社會史者好好研究。無論是留學東洋，寄居京華，還是僦居章門、樟樹；也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在社會生活等方面，歐陽成都處在鄉土關係網之中，如熱心參與同鄉會活動³、編著故鄉文獻⁴以及支援宗族建設⁵。小則為鄉人，親朋排難解紛，大則介於中央與地方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無不可見鄉土人情關係的影子。日記中記錄了以下事例：吉水家中表兄經商失敗，來京避債；債權人請警探追緝，歐陽成動用人際關係使其脫困，表兄最後改交由吉安商會同人議處（日記第 18 冊）。這件事至少從以下幾個方面給我們以啟示：首先，就經商而言，法律是會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的；其次，案件本身最終由商會出面議處，表明當時的商會組織已比較完善並且有一定的權威進行有效的管理；第三，人情大於國法的情況依然普遍盛行，事情發生在習研過法律之學，且擔任過國會議員的歐陽成身上，尤其諷刺意味。鄉土關係之偏執，良有以致之。

縱觀全書，作者的社會交際圈主要有三：其一是江西同鄉，其二是舉人同年，其三是留日同學同窗（日本中央大學同窗會）。作者熟諳人情世故，出遠門則拜會友朋，返則書謝友朋之照拂。正是這種社會交際圈的人際往來，作者才能與時俯仰，得謀微職，仕宦於京、於贛，而這正是傳統中國社會關係網的最好展現，這個網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無時不顯。語云，「在家依父母，出門靠朋友」正是這一現象的生動寫照。誠如作者所言，「人生於世，少賴父母之教訓，長資師友之輔相，二者皆無，欲卓爾自立，難矣。」（第 7 冊 4 月 14 日）。綜觀日記，作者一生無不與社會人情關係網纏繞在一起，這種以同

學、鄉土關係為基礎營構出來的關係網，將其人生整個包裹起來，使其日記中呈現出濃厚的鄉土人情，而這恰恰是治社會史者最感興趣的內容。

其次，日記橫跨三十餘年，對生活瑣屑之描寫，於不經意中讓人透視當時的社會人生百態、社會風俗之嬗變。如古書市場的衰落、賦詩風氣之衰、古文向白話文的轉變、新式專門考試取代科舉考試、安裝電話與電燈、由馬車而至腳踏車的出現與並行；「女子皆天足，於是皆為把鋤犁、能挑負之健婦矣……。」（第 31 冊）；而占卜算卦之學的依然勃興，則顯示出古老風俗的頑強生命力。可觀古老的社會生活在極緩慢地發生變遷、演進，於社會史、民俗史研究不無裨益。

再次，由於作者晚年棲居家鄉，熱心於家鄉的社會事務、宗族活動。因而，其晚年日記所記事實當是研究民國江西鄉村社會生活史的極佳材料，日記中對其本人的社會應酬、心路歷程的敘述亦是管窺士紳與地方社會關係的重要文本。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江西省圖書館目前所藏的《南雲精舍日記》並不完整，缺 1912 年、1914 年、1917 年和 1935 年，所以感覺記事上有跳躍不連貫之感，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另外，日記中亦有所曲筆隱諱。以作者之身份，其親朋摯友，基本上屬同一層次，即當時的士紳階層，雖有經濟窘迫之時，對於當時底層民眾之艱苦，並無深刻之理解。故對於民怨暴動，多持鄙夷，甚或由於家仇，忿忿不已。這樣的曲筆研究者尚可理解，但以其早年的政治經歷，其日記中對於共產黨活動、長征結束、西安事變等諸多大事，竟不提及。應該做何解釋？這就恐怕要等後來研

究者仔細研讀全套日記，並結合相關史料給出答案了。

註釋：

¹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13 章，第 250 頁。

² 可參考如下日記：1915 年 8 月 14 日，「籌安會六君子」通電，欲變民主國體為君主國體，作者寫道「……可謂雄雞一聲天下白者！！」則作者思想可知。1925 年 6 月 25 日，「……歸，見有工人數百成群，持旗往赴天安門開會，為對於滬案之示威舉動，臂結黑紗若赴喪然，見之令人慘然不樂。國人若飲狂泉，未可以理喻也。」1926 年 1 月 28 日，「督辦蔡公以何謂共產為題懸賞徵文……共產乃近時流行之學說，余未之究，不敢執筆也。」

³ 第 2 冊 8 月 15 日日記記任江西省同鄉會幹事；12 月 9 日日記記任吉安同鄉會會長。第 8 冊 4 月 23 日則記「改選『江西法政經濟協會』會長一職，余任事一年，今得息肩。」

⁴ 第 23 冊 1 月 1 日，「余以舊撰吉水先哲碑傳集已繕錄四卷，曠廢者久而目力日昏，楷書為難，恐後此遂成憾事，爰於今日繼續行之……。」

⁵ 第 15 冊 5 月 19 日，作募修北京吉安二忠祠捐輸啟。第 20 冊 1 月 21 日，重修楓江石橋募捐啟。第 18 冊 3 月 13 日，「允於春夏匯千金歸里，購材（以父大人有於今歲建築祠堂之意。）」。第 17 冊 10 月 25 日，「大人有意重修村中三塘之壩，囑輸金百元以助之，蓋善舉也。」